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年第 2 期 (总第 241 期)
"四库学"研究

论四库馆内外学术的开新

陈晓华

摘 要: 乾隆四库修书,汉学达至独尊地位,四库馆内外的声气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实际上,四库馆内外是存在新声的。四库馆内外汉学的开新,得追溯到黄宗羲、顾炎武等身上。黄宗羲、顾炎武等是清代汉学的开山,但发展到乾嘉时的汉学,却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最初所提倡的汉学并不尽一致。汉学,其实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与时俱进。因此,在四库修书使汉学独尊之际,新的学术也同时潜滋暗长着。基于此,文章就四库馆内外学者对汉学开新而生出的新学术,即汉宋兼采、今文经学、边疆史地等展开论述。

关键词: 四库馆;内外;汉学;开新
中图分类号: Z1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9142(2018)02 - 0007 - 08

乾嘉汉学直承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倡导的学问,然而黄宗羲、顾炎武等猛烈攻击宋学的同时,亦承继其一部分,而汉学却未免固守门户拒纳他者,并且有所忽略黄宗羲、顾炎武等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不过,即或如此,新的学术还是在汉学鼎盛时期萌出了新芽。

自黄宗羲、顾炎武以来,汉学继续发展,到乾嘉时取得独尊地位。当时,"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尠。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①]。这个地位,实是乾隆四库修书奠定的。就此,有学者称"有清一代汉学家之攻击宋学者",是以《四库提要》为"赤帜"的。[②]而四库馆臣也自言"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③],宋学实为四库馆所不喜。不过,在这以官方修书肯定汉学地位的盛事中,还有别于这主流学风开出新风者。亦即,新的学术思潮也同时登场,在悄无声息中酝酿着。一种学术达至极盛之时,也是新的学术萌芽之期。

收稿日期:2017 - 10 - 15
作者简介:陈晓华,女,重庆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2016 年度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隋书·经籍志》研究史"(项目编号:16LSB013)。

①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41 页。
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小学类小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1 页。
③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 15《诗类序》,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19 页。

一、四库馆内考据义理辞章经济新识

能入载张之洞《国朝著述家姓名略》者，都是清代一方学术大家，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所以，本文以入载其中、与汉学有别的四库馆臣为例，以见学术开新。而所论纪昀等人，虽未跻身张之洞的专门著述家之列，但他们的成就，也足可为其时学术风向标，故择之。正是他们在汉学独尊之时，既对汉学及清代史学有所开新，又开启了汉宋兼采、今文经学、边疆史地等新学术。

（一）《国朝著述家姓名略》中开新汉学的四库馆臣

查张之洞《国朝著述家姓名略》，当时四库馆中人员，称得上著述家者二十一人[①]。这二十一人中，与汉学有所区别者如下表所示：

姓名	籍贯	擅长学科	派别	在馆职务
彭元瑞	江西南昌	史学、校勘学	汉学派	副总裁
庄存与	江苏阳湖	经学	汉学派	总阅官
朱珪	直隶大兴	骈文		总阅官
陆锡熊	江苏上海	史学		总纂官
李潢	湖北钟祥	算学		总目协勘官
邵晋涵	浙江余姚	经学、小学、史学	汉学派	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
戴震	安徽休宁	经学、小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算学	汉学派	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
姚鼐	安徽桐城	经学、理学、古文		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
翁方纲	直隶大兴	经学、金石学	汉学派	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
王太岳	直隶定兴	骈文家		《黄签考证》纂修官
陈际新	直隶宛平	算学		天文算学纂修官
曾燠	江西南城	骈文家		缮书处分校官

也就是说，四库馆虽为汉学家的天地，但一些馆臣或在汉学家的名义下有自己的学术喜好，或并非汉学家。如副总裁彭元瑞虽为汉学家，但精通史学，并在与袁枚的赠答中，曾明确表示自己愿意追陪袁枚学文史[②]。袁枚在当时以离经叛道名闻天下，与汉学家学问志趣殊异，彭元瑞却主动与他示好并向他表明自己的志向，无疑与袁枚学问、志趣有相通的地方。因此，彭元瑞自当为汉学家名义下还有他种学术喜好者。以汉学家身份为史学者，馆中还有邵晋涵、翁方纲、陆锡熊等。其中邵晋涵为二十二部正史写了提要，如果不是因病退出四库馆，恐怕各正史的提要都得由他完成。而邵晋涵治学，虽名列汉学，但私淑阳明、蕺山、南雷。他为学，专治《尔雅》，精研史事，也是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派的重要人物，为汉学中富有自己特色者。当然，作为清代今文经学开创者庄存与门人的邵晋涵，所学与耳濡目染，也必然与专门汉学有别，讲究“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③]。既然邵晋涵的史学以汉学来培源固本，又是经世之风的倡扬者，自然能逃离宋学的浮泛空虚，也能摆脱汉学的繁琐拘泥，无疑既开新了汉学又开新了史学。

翁方纲，则引考据入诗歌创作中，“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④]把汉学运用得出神入化，热衷汉学可谓极致，但他这个汉学家是为汉学推陈出新者。他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当以衷于义理为主。当钱载斥戴震破碎大道时，翁方纲却

①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巴蜀书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
② （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少詹和诗》，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7 页。
③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 页。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翁方纲》，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430 页。

为戴震辩解："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①]作为汉学家的翁方纲，一方面维护汉学尊严，为汉学正名，要求大家不可视训诂名物为破碎；一方面申发之，认为由训诂名物也可讲义理，而圣人之道的获得，也不必竟由典制名物而来。翁方纲以汉学为本，去追求义理，相较于纯粹为考证而考证的汉学家们而言，高明多了。这也预示着汉学日后走向汉宋兼融道路的趋势，预示着学术未来的变革。由此也可见，翁方纲为学虽有所本，但并不排斥其他学问，能吸纳他者之长。并且，翁方纲大有文人雅趣，好金石文字书法，好交纳名士，喜聚会结社，在书籍存毁上的政治行为较少。对于书籍，无论标明"毁"或"酌"，最后他仍多建议不毁而存目。而聚会结社，这是乾隆中期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孕育乾隆之后一变体。为嘉庆时吴嵩梁等人组织的、有陶澍与林则徐参与的宣南诗社的胚胎。这一切都宣告着翁方纲以汉学家身份对汉学的开新。

此外，以汉学家身份尚持有其他学术喜好的四库馆臣，不唯以上著名汉学家，连汉学领袖戴震，也有所表现。戴震，其实也并非纯正统的汉学家。他综形名，任裁断。分析条理，都精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单凭断以己意，与汉学正统就肯定是有别的。纪昀曾批评宋学家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而汉儒说经以师傅，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改，然它的弊病不过失之拘。[②]明显不主张理断，偏袒汉学。但作为汉学领袖的戴震却断以己意，此等行为，无论出于何故，都难逃宋学的理据，当然偏离汉学正统了。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更是如此。而他说"一夕而悟古文之道，明日信笔而书，便出《左》、《国》、《史》、《汉》之上"[③]，更有心性之学的顿悟。并且戴震说经，不专主郑玄之说，自然惹得汉学正统纷纷攻击。为此，章学诚曾专门为之正名，指出那些认为戴震《原善》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根本不知道戴震学问的人。戴震以汉学领袖透露出对宋学的兼采，足可表明汉学已在悄然变化。

再者，馆内还有一需要特别提到的人物——庄存与。庄存与是汉学旗帜下的经学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入四库馆，充馆臣，任总阅官。他专治春秋公羊学，兼及六经，是常州学派创始人之一，也是清代今文经学首倡者。著《春秋正辞》、《毛诗说》、《易说》、《尚书说》等。汉学滥觞过后，庄存与开创的今文经学就是取代它的学术之一，并且作为皇子永瑆的老师，关心兴衰存亡，也使他虽为汉学家却又能超越汉学藩篱，开出新学问。

今文经学以庄存与治《春秋公羊传》为源起，他著《春秋正辞》，刊刻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微言大义"。汉学发展到后期，埋头考据，繁琐不过问实事，顾炎武等初期倡扬的积极入世的精神，经过官方和学术界的沆瀣一气，几乎消失殆尽。被汉学排斥出官学地位的宋学，其所有的那一套礼仪廉耻，被宋学家们自己也抹煞得几乎没有说服力，并且时代发展到乾隆后期，国势已在发生变化，敏锐的思想家们已经感到暗藏的风雨，他们以先行者的嗅觉从学术上首先发起了变革，经学被加以重新阐释，希冀以此来补清朝的漏洞。当盛世一过，需要补治国家漏洞之时，当汉宋学都无法应对时代的迫切需要之际，今文经阐释经文以为世用的地位便会日渐凸显出来，并且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走上前台，担任主角。不过，庄存与的思想只有藏之"名山"，留待后人彰显。钱穆道："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学不显于世，而颇为后之学者所称许。阮元序其书，谓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又谓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④]其后，庄存与的儿子庄述祖与外孙刘逢禄继承并发挥了庄存与的思想。尤其是外孙刘逢禄任职礼部十多年，"以经义决疑事"[⑤]，而为世钦服，充分体现出公羊家"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公羊学张大其帜，异军突起，影响与日俱增，终于实现在清代的全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翁方纲》，第3430页。
②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孝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6页。
③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六》，第93页。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0页。
⑤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397页。

面复兴，就是刘逢禄一手开创的。刘逢禄所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①不过，因源出汉学，《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也深受汉学的影响，尤其在考据上用功很大。只是刘逢禄并没有停留在汉学家的繁琐考据上，他考据的目的在于研求"微言大义"、通经致用，异于当时的汉学家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的开头三例是"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亦即何休所道的"三科九旨"，可谓抓住了公羊学的精髓。在这基础上，刘逢禄更提出"王者时宪，咸与维新"。刘逢禄所处时代，清代的盛世光环已不在，他去世后11年，鸦片战争爆发，暴雨欲来风满楼，刘逢禄的心境与当年何休定有相通之处。刘逢禄是希冀通过阐释公羊的微言大义，来挽救世风，改革制度，兴利除弊，重新回到盛世。

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和魏源更进一步提出"经世致用"，以公羊学解经著书立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②。这个时期，国势更是巨变，奋发图强成为时代主题，今文经学因其为政治服务的能力遂被推到前台，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究的经世致用思想，无论宋学或汉学兴盛之际，虽然都有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并有所言及，但力量单薄，不足以掀起复苏浪潮，到这个时候方蔚为兴盛，中国的变革亦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今文经学在光绪年间表现得更活跃，康有为等借今文学以为政治变革张本。康有为提倡"维新"，主张"君主立宪"。不过，他需要找到中国古代经典的根据，方能得到当时士大夫的理解与共鸣。他找到的根据是"公羊学派"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理论，孔子则被请出来做了"维新运动"的后台。对于由今文经而最终引发的社会大变革，张之洞在戊戌年曾有一首题为《学术》的诗，他在诗中道："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其自注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③对今文学反汉学之道而行，导致学术变化乃至世风变化颇不满，诗中刘郎即指刘逢禄。张之洞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左右逢源，然而他内心大约并不愿意看到时局的变化。依照他看来，汉学不变，历史会重写，绝不至于有今日的局势，大有怪罪今文经学兴起变革、导致国势衰落之意，颇有些胡适所谓"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虽然张之洞的愤懑与抱怨溢于言表，但于事终究无补。不过，倘若我们不论其余，张之洞对学术关系一国民生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除以上汉学家自己内部立异汉学开出新学术外，与汉学家为学对立的宋学家，肯定是立异于馆内主流学风有所开新的。如被朱筠举荐入馆的宋学家姚鼐，不到一年就退出四库馆，即是学风立异四库馆的缘故。他的弟子毛岳生曾这样描述老师："先生尝云'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词章三者，世必有豪杰之士兼收其美'，若先生者，可谓具得要领者也。……当乾隆间考证之学尤盛，凡自天文舆地书数之学皆备，先生遂识综贯诸儒多服而终不与附和驳难，惟从容以道自守而已。时纪文达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先生与分纂。文达天资高记诵博，尤不喜宋儒，始大兴朱学，士以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内多古书，皆世阙佚，表请官校理，且言所以搜辑者，及是遗书毕出，纂修者益事繁杂，诋讪宋元以来诸儒，讲述极庳隘谬盭可尽废，先生颇与辨白，世虽异同亦终无以屈先生。文达特时损益其所上序论，令与他篇体制类焉，先生以既见采用置弗编次，然其书实无害为私家著录也。"④从他弟子所言来看，姚鼐是在四库馆中汉学之风大炽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学风，为宋儒辩白，但并不反对汉学，持论公允，为汉宋兼采者。然而，弟子言师，未免矫饰。汉宋兼采，其实并非姚鼐学风。姚鼐虽未公然以宋学自号，但观姚鼐的另一弟子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抨击汉学一派不遗余力，以及方东树从梁启超那获得"革命事业"的赞誉，也是姚氏本是宋学派无疑之一证。⑤ 又姚鼐曾欲师事戴震，但戴震拒绝了。姚鼐出自桐城一门，戴震以汉学家身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9页。
③ （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诗集四·学术》，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005页。
④ （清）毛岳生：《惜抱轩书录序》，（清）姚鼐：《惜抱轩遗书三种·惜抱轩书录》，光绪已卯春三月桐城徐氏集刊。
⑤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第14页。

份执学术牛耳，睥睨学界，本就有以学术凌越学界的一面。章学诚就曾批评戴震不通史学，缺少史德，却又盛气凌人，并专门作《朱陆》篇以正戴震学术心术的不纯。所以，戴震自己虽为汉学家，并一定程度上兼采宋学，但对与自己学术路数迥然有别专门宋学家，以戴震脾气、心性，是断不会收入门墙调教的。章太炎曾为这段公案作结："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褥之间，特稍恬惔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它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兼容。丽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它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①]章太炎以古文经学家身份论汉宋学，难免顾此抑彼。此处论桐城派就用语颇不敬，贬低之意溢于言表。但他对戴震个性的揭示却是深刻的，从中不难看到，作为当时学界领袖之一的戴震，其偏执的一面，而这更可为姚鼐立异汉学、为宋学一派、但治学并不废汉学的考证的明证。

又馆中还有算学家，算学家又有中法、西法两派。陈际新专力西学，他寻绪推就，质以老师明安图生前面授之言，至乾隆甲午，续就了老师明安图未就的《割圜密率捷法》。[②] 李潢专用中法。阮元曾极力表彰李潢对中历的精通，称他"能发古人之真解，与古人息息相通，可谓力挽迴澜，初非西学者所能窥其厓岸，倒置黑白也"[③]，并认为李潢《九章算术细草》"第三术羼列西法开方两算"是他人妄增，刻书时芟除未尽之故。姑且不论李潢《九章算术细草》"第三术羼列西法开方两算"是否他人妄增，至少可以说明西法在当时已广有影响，必得西法方能完善中法为大多时人的共识，所以有了阮元认为的非李潢所作的画蛇添足的败笔。戴震虽兼用中、西法，但对西学还是颇推崇的。戴震曾师从笃信西学往往并其短而护之的江永，也因自己老师的影响也时或不免对西学护短。[④] 可见，对于中学西学，虽然四库馆臣以自顺治以来由康熙确立的"西学中源"观念为尊，但还是有其他声音存在的。

（二）《国朝著述家姓名略》之外开新汉学的四库馆臣代表

除以上见诸张之洞《国朝著述家姓名略》所列四库馆内有别汉学学风、开新学术者外，馆中还有其余与汉学有别开新学术者，如刘统勋、蔡新、程晋芳、朱筠、纪昀等。

当时，朱筠上书建议开馆修书，并辑佚《永乐大典》，作为宋学家的刘统勋，日后的四库馆正总裁，就曾极力反对。刘统勋认为修书非急务，四处搜书易扰民，并担心乾隆借此兴文字狱，朝野文人学士借此再启朋党之争，所以刘统勋也一并反对辑佚《永乐大典》。除刘统勋外，以宋学家身份与汉学有别的四库馆正总裁，还有蔡新。蔡新为宋学家，据《清史稿》记载，蔡新致仕后，乾隆每制文，屡以寄新，且曰："在朝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称颂。"蔡新的学问以求仁为宗，以不动心为要。尝辑先儒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诸语，曰《事心录》。上书房四十二年，培养启迪，动必称儒先。乾隆以蔡新究心根柢，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⑤] 虽然，刘统勋、蔡新在四库馆内职在监督，非实与馆中修书之责，但二人的学术身份及倾向，是必然别于馆中学术主流汉学，且有所开新的。

程晋芳乾隆二十七年（1762）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后入

①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册《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7—158 页。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 3573 页。
③ （清）阮元：《畴人传》，清文选楼丛书本。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第 324 页。
⑤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宝 永贵 蔡新 程景伊 梁国治 英廉 彭元瑞 纪昀 陆锡熊 陆费墀》，第 2768 页。

《四库全书》馆为修纂，任编修。乾隆四十八年（1783）请假出都，历河南、陕西等地，后卒于陕西巡抚毕沅幕中。程晋芳善诗，性耽书史，“见长几阔案心辄喜，铺卷其上而事不理”①，博综经史，但笃守程朱，认为宋儒虽有失误之处，然“天道人纪，节心制行，务为有用之学，百世师之可也”②。与袁枚的书札称颜元、李塨讲学有异宋儒者，实获罪于天，诋宋儒如诋天。无宋儒吾辈禽兽木石，③有宋儒而死节者多④。正是程晋芳的宋学家身份，令他在馆内外都颇不得志，最后病逝于毕沅幕府中。他为文，袁枚言晚年达到了纡徐层折。⑤ 程晋芳作为袁枚的朋友，也曾建议袁枚删集内缘情之作，⑥明显有道学家说教的一面。

因此，对时人受汉学风气影响以考据为诗，堆砌材料，作为宋学家的程晋芳自然也深为反感。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载了程晋芳一则轶事，非常有力地表现了程晋芳对以考据为诗者的态度。

> 某侍郎督学江苏，罗致知名之士。所选五古最佳；七古则不拘何题，动辄千言，引典填书，如涂涂附，杳不知其命意之所在。程鱼门阅之，掀髯笑曰：“欲吓人耶？此扬子云所谓‘鸿文无范也’，吾不受其吓矣！”⑦

此外，程晋芳曾对《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盖棺定论：“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程晋芳能道出这话，也是二人有共同境遇的结果。程晋芳、吴敬梓同为徽人，同出生豪富世家，但都不问生产，最后都逝于为成就理想而来的贫困。

而建议开馆修书的汉学家朱筠其实也有别于四库馆主流学风。在朱筠和袁枚的赠答往来之作中曾明确表明自己不愿意逐身于流俗中，即使无权力与实力，也愿意义无反顾辨正。⑧

四库馆内学者对汉学的开新，连总《四库全书》之成的总纂官汉学家代表纪昀也有所体现。纪昀不仅收藏四库馆汰除的异端书籍，而且他的《阅微草堂笔记》还突破了程朱理欲之念，批判以理杀人，肯定理存于欲，分明在歌颂异端。还颇可贵的是，纪昀不宥守声韵为中国固有的学说，承认声韵学肇始于西域，也分明与顺治以来官方确定下的“西学中源说”相背。纪昀以上诸行为，显然与乾隆四库修书确立汉学官学地位来一统思想的主旨背道而驰，也与他的乾隆旨意执行者的身份颇不相符。当然，要指出的是，纪昀背离主流学风与思想，是偶而有之，悄悄为之。不过，无论怎样，也多少表明了纪昀身上的变化，也多少反映出士大夫阶层内部学风与思想的悄然变化，即使如纪昀这样的坚守者也不例外。

二、四库馆外考据义理词章经济新识

别于汉学，四库馆外开新学术者，兹就章学诚、洪亮吉、袁枚三人以见一斑。

章学诚为汉宋兼采者，朱筠建议四库开馆，就出自他的谋划，但他一生未入自己向往的四库馆。对四库修书利弊，当时史学的发展，他都有深刻独到的认识，且颇中肯綮。方志学在清代确立，也实赖他促就。同时，他的方志学又和史学息息相关。他提出方志立三书之议，即是为了明“史学”⑨。他所著《文史通义》，实是基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对古今学术作出的一次较全面的理论总结。

---

① （清）昭槤：《啸亭杂录》卷9《程鱼门》，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5页。
② （清）翁方纲：《程晋芳墓志铭》，（清）钱仪吉：《碑传集》卷50，清光绪19年江苏书籍刻本，第5页。
③ （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9《与程蕺园书》，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第332—333页。
④ （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9《再与蕺园书》，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第335页。
⑤ （清）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0《与程蕺园书》，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第526页。
⑥ （清）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0《答蕺园论诗书》，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第526页。
⑦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3，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第88页。
⑧ （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9《附来书》，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第329页。
⑨ （清）章学诚：《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第123页。

具体而言，对史学，他讲“六经皆史”①，并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②，认为史学在于经世，舍今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都不是史学。③ 史学关注的重心当在现实，历史考证终归是为了更好服务当代，而不是发思古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④他意图救治乾嘉时期不少史家佞古成癖、矜炫于“博古”而昧于“知时”的流弊，扭转“文以载道”、“义理明道”和“训诂明道”的治学门户之见，希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⑤，改变“经师互诋，文人相轻”的局面，所谓“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⑥不过，他的这些观点鲜有同道。邵晋涵曾描绘时人对他《原道》三篇的反应：“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依书相规诫者。”⑦对此，章学诚自己的解释则是：自己作《原道》三篇，只是为三家分畛域而设。“篇名为前人迭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⑧他不会因观点不合时宜就放弃“以史明道”，抛掉自己为学的根本。当时史学与四库修书的关系，章学诚也以史家的敏锐洞察到了。他指出，“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⑨。正是四库修书，使当时学人能坐集千古之智，一改往日学风，讲求史学。当然，这种史学如他所言也正因为闻见丰富，所以“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⑩，明显带有汉学的弊病。故而，对四库修书，一方面他认为它有总结学术文化的功劳，一方面对四库修书下学术风气日趋琐碎走向考据一途、不讲求义理的现状很是不满，并做出了尖锐批评，认为“义理、考据、辞章”应并重，并对历代史馆修书提出了异议。此外，章学诚对汉学宋学也有较公允评说，他认为宋学自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它的流弊在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有所谓道。而以道名学，则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结果则为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以致通儒耻言宋学。然而当今对宋学的态度，也不宜效法。在一片声讨宋学的风气下，甚至村荒学究，都可抵掌而升讲习，指责宋学的不是。这种风气下，虽如程子朱子，犹见议于末学。他建议“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⑪，认为学术界应公允对待宋学，对汉学之热也应抱平和之态。

当然，时代学风在章学诚身上也有表现，诸如史学批评必须继承多闻阙疑的传统，不可凿空立论，不无汉学踏实谨严的学风。这也正是他能汉宋兼采的一个前提条件。汉学宋学各自的利弊，他以学术先觉者身份先知先觉了，因此他自然与潮流相左，难有知音。

洪亮吉虽然为四库馆校书，并得以交结京城名宿权贵，最终借此获得了功名。但他并非四库馆臣，校书仅是为了谋生就食而已。他获得功名后，就另任他职了。四库开馆，一代学风，就食四库馆的洪亮吉深刻地感受到了。然而，他感受的既是高潮又是余韵，日后仕途的坎顿，发配边疆的经历，加以少小对民间疾苦的熟谙，使他更深刻认识到了民生，令他从书本走向广阔的天地，使他为学与乾嘉显学汉学自然有别，关注边疆史地、人口问题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把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开出新学术。

袁枚作为学界领袖，特立独行，从他平生交游看，他还是一个与四库诸臣多有往来者。四库馆正总裁裘曰修，馆臣程晋芳、朱筠、姚鼐都与他过从有加。不过，袁枚的学术几乎完全立异四库学风，别有韵

① （清）章学诚：《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第123页。
②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第92页。
③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第15页。
④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第41页.
⑤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第15页。
⑥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下》，第12页。
⑦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下》，第12页。
⑧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陈鉴亭论学》，第86页。
⑨ （清）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第177页。
⑩ （清）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第177页。
⑪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第93页。

致。据载“枚仕虽不显，而备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余年来无及者”①，讲性灵缘情之作，文风自然区于时风，别有新意。他就曾批评时风，很能切中利弊。他说：“近今风气，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写字，便究心于《说文》、《凡将》，而束欧、褚、钟、王于高阁；略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颖达，而不识欧、苏、韩、柳为何人。间有习字作诗者，诗必读苏，字必学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诗与字之源流。皆因郑、马之学多糟粕、省精神，苏、米之笔多放纵、可免拘束故也。”②并就时人一味尊崇汉学却不知其本提出了批评，继而也能公允看到汉学宋学各自的弊端，他说：

> 不知宋儒凿空，汉儒尤凿空也。康成臆说，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类，不一而足。其时孔北海、虞仲翔早驳正之。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尚且周室班爵禄之制，其详不可得而闻。又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况后人哉？善乎杨用修之诗曰：“三代后无真理学，‘六经’中有伪文章。”③

还说：“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诬也！”④对同时代的主流学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而对非主流学术宋学的批评中也有肯定，显然开出了新风。

总之，四库修书时，虽然汉学一尊，但学术界并非全然一音，新的学术与思想在其间也已显端倪，为后来学术变革埋下了伏笔，影响深远。

Academic Innovation in and outside of the Siku Repositories

CHEN Xiao-hua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When Emperor Qianlong decreed the redac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sinology gained a supreme status, with scholars in and outside of the imperial repositories reaching a high degree of consensus about the project. But, different voices did exist. The first sign of innovation can be traced to such early masters as Huang Zongxi, Gu Yanwu and others, long regarded as the forefathers of Sinology in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Qianlong to Jiajing, however, sinology witnessed some new developments, a sign of innovative growth. This means that even during the high tide of sinology, there were already new scholarly undercurrents gathering momentum. This paper seeks to elaborate on the new scholarship that was at work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dac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including borrowings from both Han and Song traditions, the flourishing of the new text school, the rise of frontier history and geography, etc.

Key words: *Siku Quanshu*; in and outside of the imperial repositories; sinology; innovation

(责任编辑：若峦)

① 国史馆编《清史列传》卷72《文苑传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85页。
② (清) 袁枚：《随园诗话》卷2，载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三)，第37—38页。
③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2，载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三)，第48页。
④ (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答惠定宇书》，载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第306页。